

教育部召开《图书馆学基础》审稿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至八日，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召开了统编教材《图书馆学基础》的审稿会。参加这次审稿会的，有国家文物局图书馆处，上海师大、吉林师大的图书馆学系，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上海、辽宁、四川、湖北、甘肃五省市图书馆，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有关同志。北大、武大图书馆学系编写这本教材的同志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经过认真审议，与会同志认为这本教材总结了我国图书馆的实践经验；初步肃清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理论是非得到了澄清。如，图书馆的性质和社会职能、图书馆的服务对象等问题，过去图书馆学教材中的一些简单化、绝对化的提法得到了纠正。与过去同类教材相比，这个稿本前进了一步，基本上做到了科学论述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有较新的学科体系，反映了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的学术水平。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本教材基础是好的，希望编者吸取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尽快修改及早出版，以满足图书馆学教学和培训图书馆在职干部的迫切需要。

在审议过程中，与会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这些意见都很有启发的。现将这些看法简述于下：

关于图书馆有无阶级性问题议论得比较多。现在图书馆界有种说法，认为图书馆，特别是科技图书馆是没有阶级性的。有同志指出，我们不能被什么“国际联机检索”、

图书“资源共享”等口号所迷惑。一些尖端资料在别人不解秘之前联机检索也是检索不到的，也就“共享”不了。在阶级社会中，书籍属于上层建筑，总是有阶级性的，因而不能笼统地提“读书无禁区”的口号。有同志认为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来看，图书馆是不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才产生、发展的值得考虑。阶级性不是图书馆的根本属性。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与阶级斗争没有必然联系。归纳起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阶级性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倾向：超阶级的观点和把图书馆的阶级性提到吓人的地步。图书馆是上层建筑，但它从根本上有别于军队、警察、法院等等。不能从概念出发，要从事实出发，要研究图书馆区别于其他上层建筑的个性，恰如其分地对待其阶级性。极左思潮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要研究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图书馆阶级性被提到不适当的高度，违背了图书馆本身的规律，使事业遭到了损失，有那些表现。

读者服务工作也是议论得很热烈的问题。有同志提出这样一个原则：以最低限度的藏书满足最大限度的读者的需要。他说，我们办图书馆每天绞尽脑汁在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个根本问题。研究藏书和研究读者都是为了解决这个根本矛盾。也就是图书馆要讲究经济效益，使每本图书都发挥最大的作用。他说这是从丘巴梁的图书的社会公有和个人使用的矛盾的论点进一步演化来的。有同志认为图书馆要解决藏与用的矛盾：阅览和外借、送书上门与阵地服务、重点与一般、开架与闭架、图书整理与读者工作等等关系。图书馆学在读者服务工作问题上所要

研究提高的就是这些问题，就是这个核心。有同志提出要从分析各类型读者使用图书的特点入手加强图书馆学的理论。读者工作的方法是随着各类型读者的特点产生的，过去那种强调“送书上门”的一刀切，并不一定是读者工作的好办法。对读者工作提出有区分性服务的原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有区分性服务才能做到针对性的服务。如阅览和外借、送书上门与阵地服务、重点与一般……等问题的研究，离开了有区分性服务的原则是得不出任何正确结论的。

与会者一致认为图书馆的现代化问题决不仅是使用电子计算机的问题。图书馆现代化是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密切相关的，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因而必须有思想、组织、政策、机构、工作方法和领导思想等各方面的变化。有同志指出，计算机并不是图书馆现代化最本质的东西，科学管理也是图书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们的管理思想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封建藏书楼的阶段。那种惜借思想和封闭图书的做法正是藏书楼思想的反映。说“开架闭架各有优缺点”，过于客观；从闭架到开架应该说是管理思想的一大进步。当前，管理思想的现代化被忽视，是我们图书馆事业的薄弱环节，急待提高。电子计算机的普及还需待以时日，当务之急是管理思想、管理科学的现代化。统计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图书馆统计是图书馆科学管理的必要手段。而我们抓得很不够，理论研究也不够，几乎是空白。统计十分重要。没有图书馆事业统计，就无法知道事业发展水平，不知道网点类型配置比例合理与否，也没有制订事业发展规划的科学数据。没有图书馆工作统计，就无从判断每个图书馆的工作水平，难以知道经济效果。一个图书馆的工作成绩应该有统计数字，比如读者人次、出借率、拒绝率、使用率等等来表现，不能光靠文字总结。文字总结不能确切地表现工作质量。

很多同志提到应该研究图书馆事业史，特别是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今后的工作。建国三十年来的图书馆事业史今天已经有条件来研究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用实践来检验，错误的要大胆否定，正确、正确的做法要坚持。这样的总结会对今后工作起指导作用。对林彪、“四人帮”给图书馆事业所造成的浩劫要批判要总结。要历史地总结历史。对建国前的事业史，包括一些人在内，也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某些机构和人的作用，也不要缩小某些机构和人的作用。有的同志提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应该从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综合来考察，经济和文化起较直接的影响，政治起一定作用。也有同志说，当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图书馆总是受摧残；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时候，图书馆得到发展，这个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如何推导图书馆的阶级性问题。

讨论到图书馆学的对象时，有同志提到五十年代对刘国钧教授的五要素说所进行的批判。虽然批判了五要素说，但刘先生的五要素说：书、读者、方法、馆员、设备，在某种意义上讲仍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然，现在研究是以整个事业作为单位来研究，而刘先生是以单个图书馆作为对象。但学术研究，即或是错误的观点也不可用来批判的方法来对付。五要素说究竟对还是不对，应该研究。这种以批判来对学术观点的做法今后不能再搞。没有学术民主，就没有图书馆学的繁荣和发展。

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图书馆学的研究，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从目前看，对国外的情况了解、介绍得不够，借鉴不够。有同志作了个粗略的分析：从旧藏书楼发展到现代图书馆这期间的图书馆学杂志发表的文章里看来，解放前都在藏书里作文章，或研究版本，或考证作者，几乎没有研究读者服务工作（下转第54页）

邵宝死后一年，则秦校本《容春堂后集》，自然没有经过邵宝审定，很难肯定一定是邵撰原文。第二，“铜字板”的说法与华氏家族保存包括邵撰传文在内的四篇传记的说法都不同，自以华氏家族保存、编写的记载较符实际。第三、《明史》卷一九四《乔宇传》载：乔宇是“山西乐平人”，刘瑾败后，“拜南京礼部尚书。……世宗即位召为吏部尚书。”据《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正德五年“八月甲午，刘瑾以谋反下狱。……戊申，刘瑾伏诛。”乔宇任南京礼部尚书应在正德五年以后，嘉靖以前。华燧卒于正德八年，正当乔宇在南京任内，而乔宇为什么撰《会通华处士墓表》？在《墓表》中乔宇有说明：

“华为无锡鉅姓。有会通处士者，余旧闻其名。今年夏五月，其子奎持户部侍郎邵公书衰服诣余曰：先考弃养已四阅寒暑矣，兹卜葬有日，敢乞一言以表墓上之石。既而鸿胪毛公贞甫、王仪部钦佩又力为之请，余弗得辞。”

这段话说明乔宇和华燧本无关系，对华燧也不了解，经过邵宝介绍，华燧的次子华奎的亲自请求，又由毛、王等人力请，然后勉强答应写的。因此，乔宇一定看过邵宝写的

《会通华君传》等材料，听过华奎介绍他父亲的事迹，然后才能写出“范铜为版，镂锡为字”这样明确的文字。乔宇撰《墓表》的经过和《墓表》的记载，是证明邵宝《会通华君传》原文是“为铜版、锡字”而不是“为铜字板”的有力证据。

从上面的材料说明：华燧所印原书上的“活字铜版”的确切理解应是“锡活字铜版”而不是“铜字版”。至于正德年间，无锡华坚所印的书如《白氏长庆集》、《艺文类聚》《春秋繁露》（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六〇八至六一一），书上所记“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或“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板校正印行”，以及嘉靖年间无锡安国所印的书，如《吴中水利通志》（见《中国版图录》图版六二二至六二三）所记“安国活字铜板刊行”的“活字铜版”，是否也象华燧会通馆印书一样，可以认为“锡活字铜版”，因未见其它文献联系研究，不便臆断，有待继续调查。但从活字的形态看，与会通馆活字相似，也不能说一定是铜活字，没有锡活字的可能。

● 本文为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论文材料之一，本刊发表时经作者作了改订。

（上接第74页）

的；解放初期那时的杂志研究编目的文章多了；后来研究目录体系；又后，才有读者工作方面的文章出现。这个“时间表”和国外有差距，五十年代国外对读者工作已有较多的研究。要摸清国外情况，要赶上。

有同志建议图书馆学教学程序可以倒一个个儿。可以先从什么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讲起，然后再讲什么是图书馆学 and 如何进行研究。从具体到抽象，从实践到理论，符

合人们的认识规律，这样讲对没有实践经验的学生更有效些。

很多同志建议要加强图书馆网的工作，规定各馆的收藏重点，使藏书建设更加有效。要建立地区的保存本图书馆，使一些基层图书馆有可能淘汰陈旧书籍。目前没有保存本图书馆，结果一些县馆也追求藏书的小而全，库容负担很大而使用率不高。还有同志提出要有图书馆法规。

（汪家熔）